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金銀玉石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金银玉石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联合出版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金银玉石卷》

国家文物局主编

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200040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鲗鱼涌芬尼街2号D侨英大厦

制版：昌明制作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30号新都城大厦

C座536室

印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头内环路南光路口 邮政编码518051

发行：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开本：1180×1060 1/16

印张：32 插页：4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

印次：1999年4月第4次印刷

印数：7001—8500

书号：ISBN7-5326-0378-4/J·14

定价：458元

(发行于中国大陆)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金银玉石卷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主 编 单 位：国家文物局

主 编：彭 卿 云

副 主 编：刘 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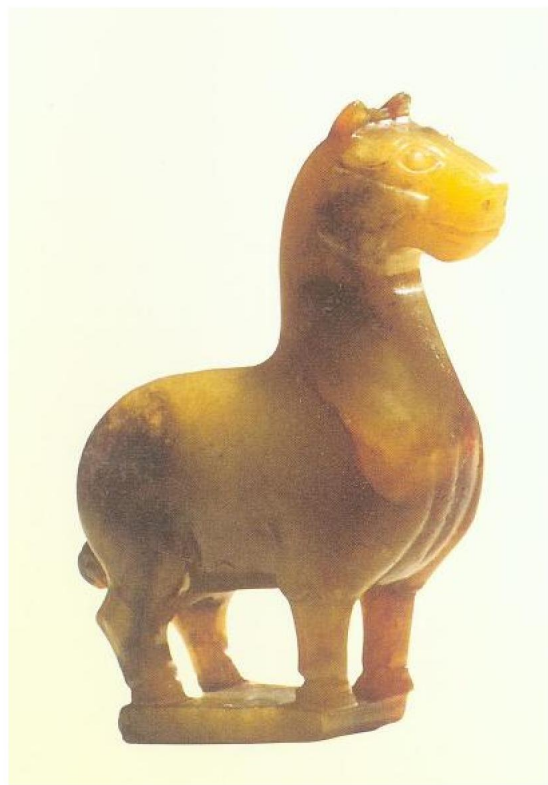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承源	王芝芬	王志敏
王克荣	王勤台	王翰章
尤翰青	甲央	叶佩兰
史树青	白云哲	吕济民
朱世力	庄敏	刘谷
刘炜	刘九庵	孙传贤
苏俊	杨子荣	杨仁恺
杨关林	李复华	吴正光
邱宣充	沙比提	沈竹
宋伯胤	宋良璧	初世宾
张春生	陈仲明	陈全方
陈孟东	罗哲文	周其忠
侯菊坤	姚立信	姚苑真
耿宝昌	殷德明	高和
郭文奎	梅福根	彭适凡
彭卿云	谢辰生	谭维泗
熊传新		

责 任 编 辑：杨关林 王芝芬 谈宗英
陈光裕 王圣良 龙细玲

装 帧 设 计：江宝灵 甄玉琼 江小铎

封 面 题 字：顾廷龙



金银玉石卷

分卷主编：史树青

分卷副主编：周其忠

主要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树瀛
王勤台
艾志高
冯光生
任步云
刘建国
孙维昌
李俊德
邱宣充
张剑
张寿山
陈晶
陈献增
周其忠
宫大中
贺梓城
徐良玉
郭德维
梁柱
鲍翔麟
熊传新

白云哲

王世昌
王慈民
石志廉
成恩元
庄永贵
刘家骥
杨桂荣
李超荣
何介均
张维
张吟午
陈孟东
武敏
项春松
院文清
秦明智
徐秉琨
黄正中
董其祥
解廷琦

廖英

王平贞
王翰章
卢桂兰
吕品
刘斌
孙传贤
杨清秀
李蔚然
沈咏嘉
张广文
张泽栋
陈炳应
武志远
胡悦谦
姚世英
袁曙光
高至喜
曹刚
蒋树成
蔡鸿茹

王明达
尤仁德
白云哲
吕烈丹
刘来成
孙春格
李国珍
吴诗池
张荣
张文芳
张荫才
陈梗桥
周世荣
胡德生
姚苑真
夏更起
郭素新
曹者祉
程竹敏
谭用中



主要摄影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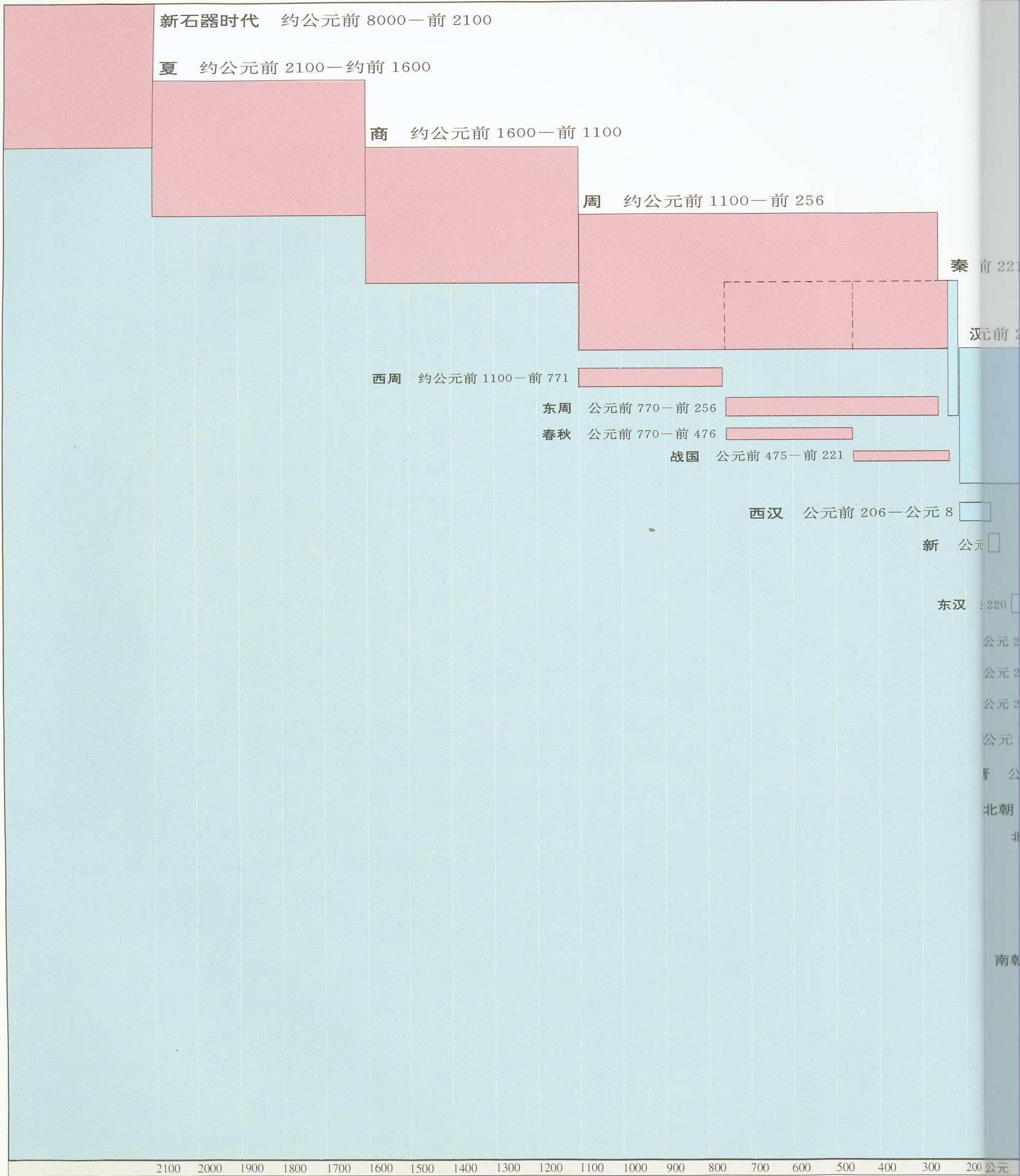
马晓旋
邢毅
杨林生
武可荣
郑铭桢
高虎
熊寿昌

王书德
池卫
余乐
罗忠民
赵家有
郭群
潘炳元

王晓涛
孙克让
张慧
金陵
郝勤建
董宏征

孔群
杨术
张书敏
郑旭明
侯明德
解廷琦

中国历史年代表



公元前 221—前 206

汉 公元前 206—公元 220

三国 公元 220—280

晋 公元 265—420

公元 23

南北朝 公元 420—589

公元 25—220

隋 公元 581—618

魏 公元 220—265

蜀 公元 221—263

吴 公元 222—280

西晋 公元 265—316

东晋 公元 317—420

唐 公元 618—907

五代 公元 907—960

北朝 公元 386—581

宋 公元 960—1279

北魏 公元 386—534

东魏 公元 534—550

西魏 公元 535—557

北齐 公元 550—577

北周 公元 557—581

南朝 公元 420—589

宋 公元 420—479

齐 公元 479—502

梁 公元 502—557

陈 公元 557—589

五代

后梁 公元 907—923

后唐 公元 923—936

后晋 公元 936—946

后汉 公元 947—950

后周 公元 951—960

元 公元 1279—1368

明 公元 1368—1644

北宋 公元 960—1127

南宋 公元 1127—1279

辽 公元 916—1125

西夏 公元 1038—1227

金 公元 1115—1234

清 公元 1644—1911

200 100 公元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中国全图





南海诸岛

500公里

总序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是一部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工具书。它的编写工作,始于1982年冬天。那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同国家文物局合作编辑、出版《中国名胜词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的工作中,发现文物辞书的巨大潜力,又提出了编写馆藏文物辞典的构想。国家文物局出于对历史文化研究和弘扬的需要,同意作为文物系列辞书工程之一,承担编写任务。翌年即行组织、部署,付诸实行。此后,各项编审工作几经周折,历尽艰难,直至今天,才有幸同读者见面。十年磨一剑,一旦试锋芒,喜悦、欣慰之情,自不待言。

文物辞书的兴起,是文物普及、开放的一项创举,也是图书出版园地的一树新花。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第一部文物辞典的出现,曾一度风靡海内外,几成纸贵洛城之势。从此,各类文物辞书纷纷面世,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各界的读者,成为传播文物知识,弘扬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但是,更多的读者渴望能有一部更具规模和权威的馆藏文物辞典,发挥多种功能,满足各界的需求。在这种呼声的鼓舞下,《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编撰工作终于开始,大家都对此书的成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此书编辑工作,除了天时之顺,还享有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中国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保存在地面的文物史迹达数十万处之多,收藏在各地博物馆内的藏品共计千余万件,其中被视为国宝的一级品共十余万件。本书共收录文物五千余件,均选自一级品,近乎百里挑一,其基础之优厚,入选品之精湛,皆可想而知。特别是这五千余件文物,纵贯全部中国历史,横跨整个中国国土,各个朝代、各个省市、各个民族、各个品类,应有尽有。既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又考虑地区、时代、民族的平衡,使之环环相扣,形成有机的整体,充分体现中国文物博大精深,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特点,反映中国文明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史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华古国辉煌历史的缩影。玉出蓝田,得天独厚。多姿多彩的中华文物,为此书提供了赖以立足生根的沃土良田。为此,编者、出版者十载耕耘,坚持不懈,决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内涵,把国内外读者引入古老的中华艺术之宫,让他们享受到永恒的美。

这样一部堪称鸿篇巨制之作,人和之利乃是成败的决定因素。国家文物局作为主编单位,为此投入人力之众,财力之多,累计起来十分可观。全国各地参与组织、协调、撰稿、摄影、审议等各项基础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均数以百计,洋洋乎大哉。在编审过程中,研讨工作之反复,与各地编写人员交往磋商之频繁,更不可胜计。为编写图书如此兴师动众,在文物界确是十分罕见的了。大家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同心同德,共赴艰难,无私奉献。尤其是分别担任陶瓷、青铜、金银玉石、书画四大类分类主编的耿宝昌、马承源、史树青、刘九庵四位著名专家,从年富力强编到两鬓生霜,自始至终,尽心尽力,坚持承担把关、定稿、作序的任务,其事业心、责任感、治学精神,均可钦可佩。在他们分别所作的分卷序中,全面介绍了各卷的文物情况,并且从文物的产生、衍变,阐释了它的价值与意义;从人们对文物的探索、认识,概括了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从文物的形态、特征,揭示了制作者的思维、创造的能力;从对器物艺术性的分析,激起读者对美的追求。此外,白云哲、叶佩兰、刘炜、周其忠、王志敏等专家分别承担各卷的主要编审任务,为之付出了大量心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这部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文物工具书,是包括许多无名氏在内的全体参与者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是许多专家、学者智慧和专长的结晶。它在各地发掘、收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专家、学者的主导作用,力求学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确保其权威性。

中国文物的丰富多彩,不单体现在数量之富,更重要的还是品类之全。历代先民生息、劳动所及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留下大量可供见证的实物。本书收入的五千余件精品,如按其用途分类,则百科具备,反映了古代人类生活的全貌。出于编辑、实用的需要,全书只能按器物质地共分成四大类(卷)。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艺术鉴赏机会,顺应世界出版业的新潮,全书一律采用实物原拍照片,其中彩图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美中不足的是台湾藏品因至今未能取得适当照片,只好暂付阙如。香港商务印书馆为了保证质量,不惜心力,采取最新技术出版精装本,向世界各国发行。编辑辞书,虽是雕虫小技,但真正适合众人的好辞书,又谈何容易。特别是文物辞书,非有图文对照不可。对于文物的鉴赏和研究,通常只能按图索骥,才有所获。因此,为了取得所需的合格照片,许多工作人员奔波劳碌,付出了大量心血。由于编辑工作的旷日持久,各地不断出土新的文物精品,又给辞书的收词时限带来了新的问题,最后经专家讨论,



决定以 1988 年为终限。但是,鉴于此后又有考古新发现,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商代墓的铜器等,曾经引起世界性的轰动,所以仍然未能忍心割爱,收录了其中若干精华之最,从而尽可能使本“大辞典”名实相副。

中国现有的馆藏文物,是中国文物宝库中最可宝贵的组成部分,它所蕴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在当今百废俱兴的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如何保护、利用好这笔财富,是当代每个中国人应该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这里必须防止把文物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全盘否定文物的价值,搞民族虚无主义,拒绝古为今用;一是国粹至上,封闭自守,夜郎自大,排斥洋为中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量有益于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文化精华,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许多能够发挥科研、教育、借鉴、审美等多种作用的文物,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研究和展示工作仍是一大薄弱环节。特别是文物图书出版对于文物保护、开放的重要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估计,以致迄今没有一套能够概括中国藏品概貌的大型图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增大。这一状况,与泱泱文物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也与改革开放的要求不相适应,早已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文物作为人类的文化遗存,既为本民族所共有,又为全人类所共享,其本身就具有开放的性质。任何珍贵的文物,只有通过保护、研究,向全社会开放,让公众领略其价值,才能有机会发挥其作用。如任其永久韞椟而藏,秘不示人,就如同废物,无任何价值、作用可言。文物又作为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同现代化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对现代化具有特殊的作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许多国家越是全面开放和发展经济,就越发重视文物的保护和开放工作。文物保护、开放的成绩,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日本在开放过程中对国外的科技文化大量吸收,其现代化的速度遥遥领先于世界;与此同时,他们对本国历史文化遗产又倍加爱护,并且通过陈列、出版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开放展示,其成绩也位居世界前列。美国的开放和现代化被视为世界之最,它把五十年以上的有历史、纪念价值的建筑等都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千方百计地收藏世界各国的文物、艺术品。法、英、德等许多欧洲国家也莫不如此。它们的文物保护、开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予以加强,各自固有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随之变得更加强烈、更加突出。为什么这些国家如此重视文

物的保护、开放,而且能够融传统与现代化于一体呢?这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但是并不神秘,归根结底,是开放与现代化本身的需要。文物通过开放、展示,不仅满足人们对文物不断增长的爱好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赖以增强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维系民族团结,激发国人的献身精神。因此,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文物保护、开放的经验,探讨传统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正确处理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特殊关系,对进一步搞好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最大限度地强化全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令人鼓舞的是,正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文物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各行各业都在抓住机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能高瞻远瞩,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改革开放的特殊需要出发,果断地确定了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总方针,并且拨出巨额专款落实抢救任务,把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推向新阶段。此时此际,《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得以问世,确是风云际会,值得庆幸。如果它能够在中国文物的保护、开放工作中起到某种填补空白的作用,如果它能够在中国文物图书攀登世界高峰之路上迈进新的一步,这将对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补偿。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里并没有自负、自夸的意思。但是,确也自信好的文物图书,能够较好地再现文物的内涵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同文物本身一样,能够跨越时空界限,跨越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人以永恒的智、德、美的感染和启迪。这样的图书一定会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当然,它也同其他图书一样,优劣高下,不能光凭编者分说,而只能由读者评论,实践检验。《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由于规模巨大,内容繁博,差错疏漏必不可免。对此,竭诚欢迎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以求“大辞典”更为完美。

彭卿云

1992年初秋于北京



序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所收文物范围主要是历史文物中的精品，全书共分四卷，每卷各成一个分册，前三卷为青铜器、陶瓷器、书画三类，凡不属于上述三类的文物，均归入本卷范围。大致包括玉石器、金银器、织绣品、漆器、石刻、砖瓦、货币、印玺、竹木牙骨器、文献等十多类。兹分别概述如下：

一、玉石器

石器的制作，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一般旧石器时代遗址，常发现打制石器、原始骨器以及用于装饰的动物牙齿、贝壳、人和动物的骨化石等物。

中石器时代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当时已使用弓箭。因此，在打制、磨制的混合石器中，常有石箭头。已发现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新疆地区。

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并发明了陶器，出现了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以生产工具为主，有石斧、石磷、石铲、石刀、石犁、石镰、石磨盘等。

新石器时代，人们在加工石器的过程中，发明了磋磨、钻孔等加工新技术。当时人们除了磨制砂岩、页岩、变质岩的农业、手工业、狩猎工具外，还磨制蛇纹石、透闪石、石英岩、硅质石等彩石玉器。故东汉学者许慎在所著《说文解字》中称玉是“石之美者”。

玉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的制作可能已发展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在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均有精美的玉器出土。其中如玉斧、玉铲、玉兵器等，当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东汉袁康撰《越绝书》，书中记风胡子语，将人类使用的工具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发展的程序。

当前，已有人根据考古中的玉器遗存，认为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玉器已彻底脱离石器，不仅是当时人们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而且还是人们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乃至宗教礼器的主要材料品种之一，因而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命题。当时的玉簪、玉环、玉璜、玉玦一类是装饰用玉，为人所共知；而玉龙、玉鸟等可能为图腾神物，玉琮、玉璧等为宗庙礼器，具有宗教或权力的象征意义。在良渚文化遗址中，随葬玉璧、玉琮等礼器的墓主，应是有特殊地位的人物。

红山文化的动物群玉雕，有龙、鸟、虎、龟、蝉、狗、蚕、鱼等，与商代玉器的主要题材相同，而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如玉琮、玉璧、玉璜、玉玦等，显系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如前面提到的玉璧、玉琮等，亦属商、周宗庙的礼器。



春秋、战国迄秦、汉时期的玉器，礼玉渐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手法普遍应用。当时，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佩列玉器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关于各类组玉的组合形式与《三礼》所记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须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习俗规范等方面，探索有关组玉的种种问题。

汉代玉器引人重视的，是不断有金缕、银缕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玉器风格基本继承两汉传统，但实物流传甚少，墓葬出土数亦不多。宋、明时期，玉器制作以生活使用器皿为多，其中仿古之作十分发达。

清代为玉器制作的振兴时期，当时，经济繁荣，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都有较大发展。新疆玉料源源开发，所制玉器多为陈设器物或生活用品，大至“大禹治水”玉山，小至龙钩、搬指，雕镂精工，纷呈异彩，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二、金 银 器

黄金性能稳定，在自然界中以游离态存在，延展性强，其特性早为古人所认识。

在考古发掘中，河南安阳殷墟有金箔出土，郑州商代遗址出有夔凤纹残金饰件，北京平谷商墓出有金钏和金耳环。平谷县金矿丰富，迄今三千余年，矿源未绝。

春秋、战国时期，河南陕县上村岭春秋墓出有金钹泡；河北易县、唐山均有春秋至战国时期金饰出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有金鼎、金杯等，金鼎器形虽小，但在考古发现史上仅此一见。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有金兽及医用金针出土，定县有西汉累丝金饰出土，新疆汉代乌孙墓出土有金指环、耳环及各种形式的金箔饰件。内蒙古凉城出土的一批西晋时期的金银器，其中有兽形金饰牌、金饰件，有的金饰刻有“猗卮金”三字，当是西晋时期拓跋鲜卑人所用。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金器多件，内有一枚金顶针和一个累丝金篮，南京东晋王氏墓群出土有金铃、金环、金钗、金簪和镶金刚石的金指环，据专家考证，当时的金刚石是从外国传入的。

隋、唐时期，金银器制作水平大有提高，西安隋李静训墓出有金耳环、指环、闹蛾金钗等物。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银器一百多件，有环柄八曲杯、环柄八棱杯、高足杯、提梁壶、双耳锅、熏炉、熏球等。器物成型以钣金锤镞、浇铸为主，采用切削、抛光、焊接、铆、刻、凿等制作工艺，有的器物留有明显切削加工痕迹，螺纹清晰，可以看出起刀点和落刀点；有的金盒上，螺纹的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子母口密合，子口系锥面加工，说明已使用车床，部分器皿纹饰、造型，吸收了中亚、西亚文化的特点。

唐、辽、宋、金、元时期，佛教盛行，佛塔地宫，多藏有佛教文物，其中如陕西扶风法门寺佛塔地宫出土唐代法器及舍利金棺等物，为近年考古一大发现。云南大理三塔，发现有大理国明治年间金佛七尊，河北承德发现契丹文金符牌，上刻“敕宜速”三字，是传达皇帝诏令，调发兵马的信物。江苏吴县元墓出土金杯，底部刻有压印的店铺、制造匠人和金器成色的文字。